



文化语言学中国潮

WENHUA YUYANXUE ZHONGGUOCHAO

邵敬敏

主编

史有为

审订

语文出版社

WENHUA YUYANXUE ZHONGGUOCHAO

文化语言学中国潮

邵敬敏 主编

史有为 审订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语言学中国潮/邵敬敏 主编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1

ISBN7-80006-852-8/H·180

I. 文…

Ⅰ. 邵…

Ⅱ. 文化语言学-研究-文集

Ⅳ. H0-05

WENHUA YUYANXUE ZHONGGUO CHAO

文化语言学中国潮

邵敬敏 主编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9.625印张 241千字

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0.00元

序

史有为

一

文化语言学中国潮的袭来，在当代中国着实是一次冲击，它激起了一阵阵不小的波澜，牵动了成千上万语言学圈内与圈外人的心。随着这潮与波的规律化，文化语言学在中国也确定地成为了一种抹不去的现实。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承认不承认，参与不参与，这一学科看来都将存在下去，并按照学科自身应有的规律发展下去。

二

文化语言学中国潮在当代的涌现是必然的。这是因为语言中也包括在汉语中，本来就存在着丰富的文化蕴含。这种文化蕴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语言以及文字并非一个孤立系统，它处在一个更大的共时与历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语言文字及其各部分的产生、变动、扩展无不受到共时与历时的社会、文化、人文地理以至民族交往的影响甚至制约，二者之间存在着不断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交换的关系。其二，语言乃是人类须臾不可离开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一方面言语及言语交际行为和文字使用必然带有使用者（民族、社会阶层、地域社区、家庭以及个人）的某种文化特点，而这种文化特点又在某种程度上说

明着并进而影响着使用者对世界的解释或认识；另一方面语言的交际功能和文字形式的符号功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大、缩小以至消失也必然受到社会的制约或选择，其中隐含着许多社会、文化的深刻原因。其三，从人类学角度来看，语言系统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从传统的狭义文化看上去的广义文化，它隐含着人类创造语言的某种意识或潜意识，而这种意识在语言结构中的分布是非均质的，或多或少，有显有隐。可以说，这三个方面既是文化语言学产生的原因，又是文化语言学研究的视角。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自古以来人们对语言的观察与研究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化色彩，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在这一中国潮中，会有如此众多的分歧与不同。人们既可以从“稻”、“葡萄”或“待业”、“爱人”、“搞”在汉语或汉语标准语中产生或落户的社会、历史和旅行地域等背景来揭示其与文化的关系，也可以从“鸡”、“鸭”、“蛙”、“妈”或“电话”、“电灯”、“洋葱”、“胡椒”等语词以及姓名的构成的理据来说明其文化性质；人们既可以从颜色词和亲属词的系统，触及汉人在主观世界中如何对颜色世界与亲属世界进行切分与重新建构系统，也可以从“买菜去啊？”“饭吃了吧？”等问候语，从“他妈的”之类的骂人话，从“三斤了！三斤了！”等吆喝语中窥视汉人特有的交际方式；人们既可以从拟声词的使用广度和频度上感觉出汉人特有的形象表达习惯，人们也可以从声韵调的音节结构及由此造成的语言节律，把握汉语特有的与音乐的潜在联系；人们既可以从传统的复句和流水句的组接方式发现汉人处理世界时的思维顺序与注意中心，也可以从“吃食堂”、“打扫卫生”、“我喜欢他老实”一类惯用语和惯用格式来感受汉人对世界的一种凝炼而又近乎混沌的重构方式。人们既可以从双语现象窥探社会与双文化在其中的制约作用，也可以从中国或华人社会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去预测汉语汉字交际功能的变化或发展；人们既可以从中国各民族文字的产生或采用、

构成与变革去探寻背后制约它的社会、文化、心理、审美等因素，也可以从汉字、东巴文字等的形体与意义相关系统推测造字时代的社会意识、心理倾向与风俗习惯。等等，等等。这一切都反映了汉语、汉字以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文化蕴含，它们都属于文化语言学或语言文化学的研究范围。一个人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进行研究，这与该研究者本身的心理、文化素质以及知识结构有关。这一切也是一种合理的必然，我们不必对此苛求一律。

三

文化语言学中国潮在当代涌现的必然性还在于这是一定时代背景下语言学发展的自身规律。50年代以来中国基本上处于描写语言学的阶段，而描写又局限于语言的结构。在这一阶段中，占主流的是中国化了的结构主义。我们不能否认，结构主义引入中国后的几十年间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为第二语言教学和自然语言处理提供了规则，从形式上为人们提供了一幅语言的结构系统图。它大有功于中国的语言学。然而结构主义将语言从社会、文化、心理等组成的复杂背景中抽取出来，把它当成一种游离于社会，游离于人文世界的纯形式系统，努力排斥意义或尽量回避意义，使语言变成一个由零件和部件组成的机械世界。对此人们是并不满足也并不满意的。他们越来越对这种单调枯燥的纯技术型描写等感到不满和不耐烦。世界是多元的，也是多彩的。语言也是多重属性的，也应该是多彩的。为什么语言的描写和解释只准有一种模式呢？为什么不能重现语言的多彩面貌，尤其是语言的人文面貌呢？不同学科的联系可能导致新的交叉学科的产生，为什么语言学不能与临近的其他人文学科结合，派生出一种新的学科？无论是其他人文学科楔入语言学，或是语言学楔入其他

人文学科，都应当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何况中国的语言是如此具有个性。“十年浩劫”之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解放，史无前例的反思接着又是史无前例的文化热，同样也席卷了语言学界。害怕文化与政治扯不清的心理逐渐消退了，躲进形式主义的出世态度开始为积极关心社会的入世态度所部分替代。而较少保守思想的中年与青年语言学家很自然地将这一切不满、不满足以及入世态度化为行动，并终于在十年前发出了第一声呐喊，亮出了“文化语言学”大旗，从此开始了一场引起争议的文化语言学中国潮。这也是必然的。

还必须指出，中国本来就有着文化语言学的传统。抗战期间，一批著名的语言学家随着新建的西南联大在云南开展着研究。他们面对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形态，自觉地将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或者民族学）联系在一起，从事着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并获得了空前的丰收。这样的传统决不会因为“左”的潮流而从此中断。因此当“文化大革命”一结束，首先响应并接中国潮的上传统的正是研究民族语言的学者。傣语文学者张公瑾就是当代最早弄潮儿之一。他在80年代第一个提出了这样的研究，尽管他并未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个词儿。在他的《社会语言学与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4期，并收入《语言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5）中，他把语言看成社会、文化现象；主张从语言和社会二者的联系中去研究语言，并彼此互相解释；提出利用语言资料来论证民族史、说明古老的宇宙观念，考证民族起源，证明重大历史事实和民族间文化交流。当我们总结80年代以来的这段历史，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这一传统，否则我们对必然性的说明就是片面的。

四

文化语言学并非始自今日。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尤其是训诂学），虽然并不系统，但却带着极浓的人文色彩。而西方的普遍唯理语法，洪堡特或是萨丕尔的语言学说甚至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其实也都是从各自特有的文化观点去认识语言的。在近代中国，语言学大师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无疑是一座文化语言学研究的里程碑。今日中国的文化语言学潮可以说是这部言简意赅的著作的直接继承。但是，当代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又并不就是上述学说或著作的简单重复与增殖，或者也不就是这些学说的简单否定或拒绝。它有着今日的时代性。

今日的研究应当是在当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当代科学的特点之一，是系统整体观。它把某一科学对象看成是一个系统、一个整体，而系统之整体值并不是内部成员简单相加之和。它把该对象与周围看成是一个更大的系统，而且将对象置于这更大系统中加以研究。当代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也正体现着这一特点，它自觉地将语言对象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人文背景中去观察，从考古，从人文地理，从社会历史，从语言形式等多方面去研究，从而完整地托出了一个多彩而丰满的语言。游汝杰、周振鹤的《方言与中国文化》正是这样做的。

当代科学的特点之二，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相互对立开始适度地让位于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迷信纯客观的绝对主义开始逐渐让位于自觉控制主体因素的相对主义。如果说自然科学尚且这样，那语言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就更是如此了。近来人们热衷讨论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人类的文化并不仅仅具有个性，它应当也具有共性，否则我们就无法建立科学意义上的人类文化学。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支，当然也并不例外。

语言中必然具有世界语言的共性，也存在共性解释不了的个性，只是在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中，个性与共性的比例将有别于其他角度的表现。在这场文化语言学中国潮的争论中，大多数人选择了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个相对主义的结论。无疑，这正是时代性的体现。

当代科学的特点之三，是在演绎与归纳二者之间，更重视演绎的作用。在中国，人们在享受了几十年归纳给予的恩惠的同时，开始补充以演绎，甚至更依赖于演绎去发现事实。既注意归纳，又重视演绎，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强烈要求。今天，人们正是从其他边缘科学得到启发，演绎出文化语言学这一新的交叉品种，进而演绎出文化词汇学，文化语音学等等支系。演绎也是一种广义的联想，而联想正是科学创造的要素之一。由于演绎的作用，人们已经并将发现更多更新的事实，而研究也正从单纯描写转为既有描写又有解释的新模式。目前的一些研究成果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当代科学的特点之四，是特别自觉地重视方法论的探讨，重视方法的系统化。方法是眼镜，是工具，没有合适的眼镜就发现不了事实，没有合适的工具也就不能把零散的事实串成系统，甚而拣不着事实。专门方法的建立和系统化又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我们需要宏观的俯视，但也需要微观的描写。我们需要理性的实证，也不可忽视感性的整体把握。我们需要科学上业已证明行之有效的假说方法、类比或比较方法以及当代发展出的系统方法、统计方法，还需要适合该学科特点的文化学方法（例如表象考察法，观念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外因分析法，个案延伸法，残余法，交叉文化研究法等）、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方法（例如社会调查法，阶层分析法等）以及语言学方法（分层分析法，共时和历时分析法）。我们高兴地看到，在现今不同风格、不同观点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中，不乏讨论方法论的论著。

文化语言学的另一时代特点，便是多元化。由于语言与文化

关系的多样性，由于主体因素的融入，由于当代社会人文背景的缘故，文化语言学在当代无可避免地将是多元的，任何观点都很难一统天下。各种不同观点在不违反繁荣语言科学的大前提下，进行自由发展与正常辩论，这正是当代文化语言学的大幸。《文化语言学中国潮》中的论文可以证实这种多元的状况，也可以为本文上述种种论述作证。

五

文化语言学是一门解释性很强的学科。解释免不了有更多的人主观因素。在讨论了必然性与时代性之后，我们想到了一句有名的格言：真理与谬误常常只差一步。我们是否应该大胆而谨慎地从事？在呐喊和轰动之后，我们是否更多地需要冷静的反思、及时的调整与扎实的具体研究？因为文化语言学必须是一门科学，而绝非是玄谈。

历史将证明，本论文集也将作证，文化语言学中国潮的涌起是大有益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语言科学的。

是为序。

1992年伏暑于日耕草舍

前 言

80年代中国语言学研究出现了两个令人振奋的趋势：一是从语言学的本体研究开始向边缘交叉学科的开拓，二是从纯形式的结构研究开始向人文属性解释的深化，从而在微观语言学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宏观语言学。这就意味着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用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重新挖掘语言与社会、文化、历史、心理、交际、民族的种种内在联系的奥秘。在这两大趋势的碰撞下，一股股语言学新潮应运而生，其中最引人注目、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是中国文化语言学新潮。

中西方任何语言，都具有深刻的人文属性，它们不存在浓淡之分，高下之别，差异主要在于人文属性的具体内涵及其表现形式。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包括音韵、文字、训诂研究，从来都是同民族、历史、地理、民俗、文学、艺术、音乐、绘画等紧密相联系的，但那时的研究往往依赖于“意念”，靠“神而明之”的“感觉”去认识；另一方面却又对语言本体研究缺乏科学的理性的分析，因而这种研究从总体来讲始终处于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以至于语言学一直未能摆脱“经学”的附庸而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王力先生称之为“中国传统语文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极为中肯的批评。我们决不想贬低我们的老祖宗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但也决不愿意把诸如清朝头顶上的小辫子一类东西都视为国宝。因此，应该承认是西方科学的语言学理论的输入，帮助我们建立了独立的现代意义的语言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没有很好地对祖宗的遗产进行整理，扔掉了一些本应该继承下来的东西，而一头扎进了西方语言学理论，特

别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怀抱，过分地强调形式分析、分布分析与层次分析，从而导致语言研究越来越疏远甚至排斥语言的人文属性，这种状况显然极大地妨碍了语言研究健康地均衡地发展。其实，即使在西方语言学理论中，也不乏重视与强调语言的人文性研究的，如洪堡特、萨丕尔的学说。到80年代初，由于国际上“文化热”的冲击，由于现代语言学所遇到的困境，由于学术上多元思潮的影响，由于社会、时代对语言学的呼唤，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认真的反思，力图从多角度对语言、对语言学进行审视，于是，有从社会角度来研究语言的，形成了社会语言学，有从心理角度来研究语言的，形成了心理语言，有从交际角度来研究语言的，形成了交际语言学，也有从历史角度来研究语言的，形成了历史语言学。中国文化语言学，正是在这样一种百舸争流的学术氛围中诞生的。

80年代中期，一批中青年学者高举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旗号，他们著书立说，以罕见的热情与努力进行呐喊，并立即在语言学界内外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仅仅十年左右时间，便已出版了六、七十部著作，发表了上千篇论文。发展势头之猛烈，涉及范围之广泛，影响程度之深刻，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罕见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迅速形成了由不同理论指导的三种流派：以游汝杰为代表的“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即强调语言与文化的双向研究，以及历时与共时的交叉研究；以陈建民为代表的“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即强调从社会变异与交际功能入手，挖掘语言与言语的文化内涵；以申小龙为代表的“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即强调语言与文化在本质属性、特点上高度一致全面认同，并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是对该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系统的意义系统。从目前从事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人来看，大部分人是倾向于双向交叉研究，他们研究的成果也最丰富最实在，涉及语言、文字、词汇、语法乃至语义、语源等各个

领域。也有不少人从社会交际角度来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少可喜的进展，在母语交际、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成果尤为显著，因而具有很强的开拓力。至于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国内的评介褒贬不一，有人把它捧为中国语言学的希望，是中国语言学“宏富的必由之路”，也有人把它视为谬种流传，洪水猛兽，或者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客观地讲，应该承认它有三个贡献：一是激烈地抨击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这对固步自封感觉太好的人来讲，无异于猛击一掌；二是强烈呼吁语言学研究要重视语言的人文属性，对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了挑战；三是大声疾呼积极活动的结果造成了一定的轰动效应，扩大了文化语言学在语言学界内外的影响。但是，坦率地讲，这一流派人物所构拟的理论框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表现在对中西语言的对立区别的看法，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认识、对汉语语法规律的理解、对汉语句型的分析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失误。因此，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商榷意见，这些学术上的争鸣将有助于中国文化语言学得以健康地发展。但不管怎么说这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在“多元”思想指导下的语言学领域也应有它的一席之地，成败得失自由实践来予以证明。

目前，中国语言学界在对待文化语言学的态度上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有少数人狂妄自大，一方面对以往的语言学研究全盘否定，一律斥之为“模仿”，似乎只有文化语言学才能拯救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另一方面，又把文化语言学捧成大语言学，把其他分支学科如社会语言学等等统归属到它的麾下；在文化语言学内部，更把自己的观点说成是最高层次，人家的则全是低层次的或较低层次的。这样的做法势必引起人们极大的反感，也不符合语言学的实际情况。二是有少数人采取一种鸵鸟政策，对新兴的文化语言学不理不睬，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一概否定它的研究价值。显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认为：语言学本体

的结构与功能研究，是基础，是根本，而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而产生的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等则是它的边缘学科，两者相辅相成，相依互存。文化语言学的各种流派也有一个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问题。各个流派发展与繁荣关键在于它的理论是否转化为具体的研究成果，并且有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我们反对的只是侈谈理论而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空头文化语言学，以及虽然有成果却不需要任何客观标准来检验的主观文化语言学。

中国的语言与文化研究虽然源远流长，但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新兴分支学科，历史毕竟还很短暂，然而它已引起国内外同行以及语言学界以外人士的密切关注。为了让关心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现状的朋友们对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选编了这一本论文集，书中收录的20多篇文章绝大多数都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论文，不少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文章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总论性质。游汝杰、陈建民、申小龙三篇是不同流派的代表性论文。邢福义、张公瑾、沈锡伦、陈炯四篇都相当有份量，而刘丹青等文则代表了中青年学者的最新见解。

第二类是分论性质。涉及语言各要素的文化视角研究，分别从语音(史有为)、文字(何九盈等)、词汇(宋永培)以及语义(王德春)、民俗(曲彦斌)等角度切入，均有不少新见。其中不少作者还是文化语言学内各分支学科的倡导者。

第三类具体研究。主要从谐音(赵金铭)、历史人名(吕叔湘)、现代人名(王建华)、语源(伍铁平)、交际(姚亚平)、历史(余志鸿)以及对外汉语教学(赵贤洲、张占一等)、外语教学(胡文仲)等方面入手。王建华、姚亚平两文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两部专著的基本观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吕叔湘先生的文章，他在题注中的一段话语重心长、耐人寻味。

第四类是综述性质。潘文国一文材料相当丰富，源流阐述也很清晰。

据统计，从1980年以来发表的有关中国文化语言学的论文已达800多篇，由于篇幅所限，许多精采的论文无法收入，这是我们深感遗憾的。

中国文化语言学如此年轻而又有朝气，它为中国语言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在20年代，乃至21世纪，这一股文化语言学中国潮必将汇集成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向语言学的海洋奔腾而去，为丰富与发展普通语言学理论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邵敬敏

1992年7月

目 录

序	史有为(1)
前言	(1)
中国文化语言学刍议	游汝杰(1)
文化语言学说略	陈建民(16)
历史性的反拨: 中国文化语言学	申小龙(28)
序《文化语言学》	邢福义(42)
语言的文化价值	张公瑾(46)
表现民族文化的语言形式	
——文化语言学初探	沈锡伦(59)
中国语言学流派与中国文化语言学	陈 炯(68)
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反思	邵敬敏(80)
科学精神: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紧迫课题	刘丹青(92)
汉语文化语音学虚实谈	史有为(106)
简论汉字文化学	何九盈等(115)
中国文化词汇学的基本特征	宋永培(130)
国俗语义学略论	王德春(137)
民俗语言学新论	曲彦斌(150)
谐音与文化	赵金铭(165)
南北朝人名与佛教	吕叔湘(183)
人名与文化	王建华(194)
论语言中所反映的价值形态的演变	伍铁平(206)
人际交往的文化冲突	姚亚平(221)
汉语的文化历史背景	余志鸿(233)

文化差异与文化导入论略·····	赵贤洲(242)
如何理解和揭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张占一等(251)
文化差异与外语教学·····	胡文仲(263)
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研究综观·····	潘文国(276)